

《我的奋斗》再版引风波(上)

◆ 龚灿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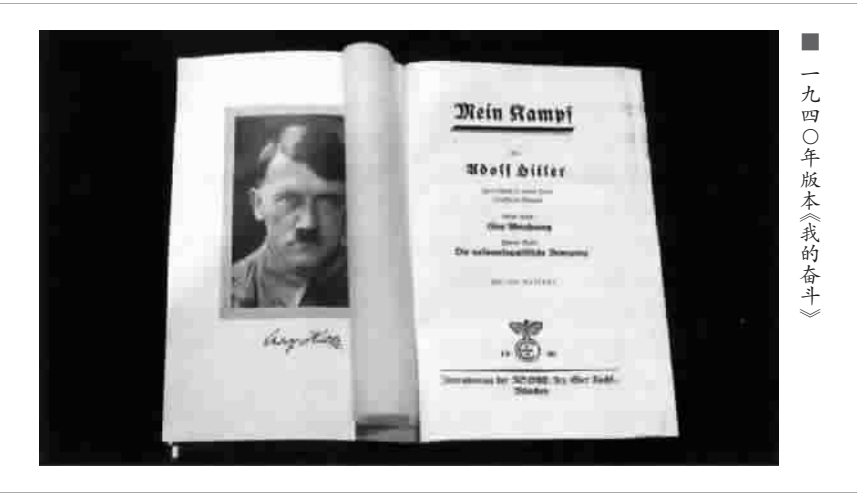
70年后首次再版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教厅长路德维希·施潘勒看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是本“该死的书”。最初他对于即将重版的《我的奋斗》非常看好,巴伐利亚州议会甚至拨款 50 万欧元预算来开展这项出版计划,并交由慕尼黑德国当代史研究所(IfZ)负责出版。但在 2012 年 9 月陪同巴伐利亚州州长前往以色列之后,施潘勒的想法发生转变。在以色列,他们与受害者人权团体、以色列内阁部长等举行了多次会谈。

2013 年 12 月,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宣布州政府从该项目中撤出,施潘勒随后发布新闻稿,称“出于尊重”大屠杀受害者,他本人也反对“这个由巴伐州主导的不光彩书籍的学术版本”的出版,不过他也表示外交因素不会影响学术界对它的处理。这也意味着,当代史研究所还可以继续开展这一项目,州政府也没有要求其归还项目资金,只是为这笔资金换了个名头。

两年多过去了,在当代史研究所的运作下,《我的奋斗》最新版已于 2016 年 1 月出版。上架才几天,首印 4000 册就被抢购一空。新版《我的奋斗》分为两卷本,多达 1948 页,包含完整的原始文本及 3500 条注释。为了规避商业利益方面的质疑,该书由当代史研究所内部出版社出版。而且为了确保该书主要由学者和图书馆等人购买,出版方将新版《我的奋斗》定价为 59 欧元,希望用高价限制该书在普通读者当中传播。

尽管该出版项目低调运作,但已引起广泛关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发表了相关的长篇大论。柏林的反犹主义专家沃尔夫冈·本茨认为新版本并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住在伦敦的德国教授杰里米·阿德勒曾试图阻止该作品出版,并在《南德意志报》的专栏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一些记者、外



■ 一九四〇年版本《我的奋斗》

交官、政治人士对当代史研究所不断提出质疑和抨击,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大屠杀问题特使道格拉斯·戴维森、以色列驻慕尼黑总领事丹·沙汉姆等人。也有人反对当代史研究所像个“保姆”似的用海量注脚来控制文本阅读,为什么不能让读者自己判断?

学术界对《我的奋斗》再版反响热烈,认为该书为希特勒研究者提供了新资料,对历史感兴趣的外行人也能从中得到丰富的新见解。美国、以色列和德国的许多犹太裔知识分子,也对该书的出版表示欢迎。犹太人中央理事德国负责人约瑟夫·舒斯特尔认为,“没有理由反对一个科学注解版本的《我的奋斗》”。

希望《我的奋斗》出版的不仅是慕尼黑的学者,德国各州司法和内政部长已经准备好了出版这本书。二战结束后,盟军将《我的奋斗》一书的版权移交给巴伐利亚州当局。尽管德国并没有出台法律禁止《我的奋斗》出版和发行,但巴伐利亚州政府以“禁止宣扬纳粹主

义”为由一直禁止非法出版该书。而按照著作权法,版权保护期限是在作者死后 70 年,因此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任何人、任何机构都可以出版和发行《我的奋斗》。

虽然已有多家出版社对希特勒自传表示感兴趣,但是鉴于该书的特殊性,目前也就只有慕尼黑德国当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有专家注解版的《我的奋斗》。由于新版《我的奋斗》首印才 4000 册,而提前预订数量已超过 15000 册,为此该书的盗版市场也异常繁荣,其盗版价格远远高于正版定价。

并非口授而乃自作

1923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因叛国罪入狱 5 年。当时他所在的监狱布置豪华如中产阶级公寓,希特勒在那里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关于《我的奋斗》的创作流传着多种说法。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这个未来的元首在狱中向纳粹党徒鲁道夫·

赫斯口授,由后者整理创作成了这本传记。但《明镜》周刊的文章指出,《我的奋斗》实际上是希特勒自己落笔完成的。在写作中,为了酝酿情绪,他甚至有时会重现往日情景。鲁道夫·赫斯于 1924 年 5 月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在我们的餐厅和客厅中,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似乎是在重温战争经历,他一会儿模仿炮弹和枪械的声音,一会儿在房间里疯狂地跳跃。”希特勒经常向狱友大声地诵读他写的某些段落。后来有出版商联系上了希特勒,他最后与当时纳粹著名的出版社 EherVerlag 签约。尽管深陷狱中,那时希特勒还是受到了来自慕尼黑上层社会的支持,包括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斯坦的妻子、监狱典狱长等人,他们都是希特勒狂热的支持者。

1925 年夏天,《我的奋斗》第一卷出版,第二卷于 1926 年冬天出版。在书中,希特勒描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德国的规划,包括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观点。当时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称该书是“一个新时代的福音”。《我的奋斗》最初的销量并不高,但随着魏玛共和国遭遇危机即将倒台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崛起,该书发行量迅速上升。截至 1933 年底,《我的奋斗》已经卖出了 150 万册,到 1945 年时销量超过 1200 万册,被翻译成了 18 种语言。

仅仅依靠该书的版税,希特勒就已经成为一个大富翁。有记录显示,1934 年希特勒收到了逾 40 万帝国马克的版税收入,当然他也没有为此纳过任何税。1936 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 47 岁生日当天收到了一本装帧极为精美的《我的奋斗》,此后该书的金箔版本被摆放在纳粹高级官员家中的显眼位置上。据说自 1936 年起,德国每对新婚夫妇都会收到国家赠送的《我的奋斗》,不过实际情形是许多地方政府其实根本负担不起。《我的奋斗》最初的 10000 册定价高达 12 帝国马克,相当于“32 公斤面包”,到今天算来则约合 300 至 400 欧元。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24.红葵花馆

1981 年,高式熊满 60 岁,准时退休。那一年,有两件事值得一记:其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六体书唐诗二十首》,高式熊分工书写其中“简体”部分。(次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六体书唐诗二十首》,高式熊还是分工书写其中“简体”部分。)其二,高式熊一行三人,骑自行车离开上海,在外面足足野了两个月。

旅伴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同事:一位是总编辑、版画家黎鲁;另一位是编辑、画家林野。9 月 1 日,三人骑自行车从上海出发,历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10 月底到达福州,一路采风,然后把自行车托运回家,三人乘火车在 11 月 1 日返抵上海。三个穷艺术家,出发前就预备去吃苦的:穿着汗衫、短裤,没日没夜地骑车,风里来雨里去;晚上在河里洗衣服,第二天一早出发,来不及及晾干的衣服用竹竿挂在自行车龙头上,活像三人小分队的旗帜;住的最便宜的旅舍,连门都没有……“一路上,人家看到三个瘪三,笑话阿拉,哪能有介慧的人!”

那年月,在一般人眼里,60 岁已经是很老的老头了,没几个老人有那么疯狂的。但对于他们仨,两个月的苦行僧日子,开启了 60 岁以后的精彩,成为后半生最甘美的怀旧元素。

高式熊的斋名,叫“红葵花馆”。退休前夕起的斋名,何以看着与书画金石全无关系?还得追溯到 1950 年初春。一日,高式熊去好友陈巨来家玩,看见陈宅庭前有一种状如牵牛、朵似扶桑的花开得正艳,清香四溢,好生羡慕,心想要是自家也能种上这么美丽的花就好了。这么美丽的花,名字叫做“红葵花”,据说是向日葵的一个变种。陈巨来眼见高式熊羡慕的神情,颇为得意,指着院子里的鲜花,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这红葵花……很名贵啊,花种是从清廷遗老家里辗转而来的。”

原来,当年清廷太子少保、北洋大臣陈夔龙对名贵花卉情有独钟,在沪上当寓公时栽



植红葵花观赏。消息传出,引得很多朋友登门求索。陈巨来的亲戚徐老太爷先得了陈家的红葵花籽,又传给了陈巨来。

高式熊本来就喜欢养花,听了这段典故愈发羡慕,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讨花。陈巨来看出了他的心思,却不舍得送花,只拿出几粒不起眼的种子送他。要知道,陈巨来因知红葵花名贵,从不轻易送人,这次送种子给高式熊已经算是破例了。高式熊得了花籽,回家当宝贝一样精心培育。第二年 7 月,红葵花就开放了。在煮饭的晨光里,红葵花枝干挺拔,风姿绰约,每一株都开出了几十朵大而艳丽的大红色花,每一朵花有五瓣……他这个花匠,欣喜地数着花朵、花瓣。

陈巨来到高式熊家玩,发现高家天井里的红葵花花朵有大碗那般大,比自家种的大得多,顿时心中不平衡起来:花可是同一个品种呀,怎么后来者反而居上了呢?是自己的花艺不如人,还是人家的土壤更肥沃呢?陈巨来懊丧的样子,高式熊看了暗自发笑,一辈子都忘不了。

红葵花生在高家扎下了根,高式熊年年勤播种,小小的天井里所有的花盆都种满了,书斋里还有盆栽的——名副其实的“满堂红”。红葵花每天清晨开放,到中午渐次萎顿,日复一日,给高家带来无限生机。

高振霄睹花如见恩师,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遂以“红葵花”为题,借花抒怀,吟咏晚境安适美好,几年间赋诗数十首。高家红葵花盛开,也吸引了艺坛同道。曾创办常熟美术学会、《太平洋画报》的水彩画教授李咏森,来到高家天井,对着红葵花写生。1953 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女弟子李秋君及其兄李祖韩登门赏花,画兴大发,兄妹俩挥毫泼墨,一写意一工笔,各画一幅红葵图手卷。红葵花手卷,被高式熊作为珍品收藏。

1980 年某日,高式熊思念离世 24 年的父亲,把书斋定名为“红葵花馆”。1997 年春天,谢稚柳先生草书横幅“红葵花馆”四个大字。高式熊如获至宝,请人精裱、装红木镜框,挂在书房兼卧室的白壁上。时隔仅数月,88 岁的谢稚柳驾鹤西去。这“红葵花馆”,大概算得上谢先生的绝笔了。

19.考军机章京落败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七十六首中感慨其人微言轻,意见无法上达:“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诗的第一句很好理解,是说自己的文章波澜宏阔、深谋远虑。第二句因用典而从字面上看较费解。“鄱阳”“夹漈”是指历史上的两位学人,鄱阳指南宋马端临,马端临是鄱阳郡人,著有《文献通考》三百余卷。“夹漈”指郑樵,也为南宋人,曾居夹漈山,人称夹漈先生,著有《通志》二百卷。这里用地名代指马端临和郑樵,是说自己的文章是经世致用的,不是他们那类文献考据类的著作。后两句则说自己预言的问题,将在五十年中即会发生。恰恰如先生所言,在他写作《西域置行省议》的五十年后——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英国人到新疆打劫时出兵入侵伊犁,又十年,光绪七年(1881),沙皇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根据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沙俄从新疆侵占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

郭延礼在《龚自珍年谱》中记载,本年“十一月初一,先生呈《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蒙古图志》,是一部关于蒙古研究的皇皇大著,是一部有关蒙古史的开创性的书。遗憾的是,此书已经写成的多半文稿以及搜存的档册图志资料,在道光二年(1822)九月二十八日先生家书楼发生的一场火灾中尽毁。现存于先生《全集》中的,仅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等几篇。从《蒙古声类表序》中可以看出,先生对蒙古的语言音韵学有精深研究,如果此著能完成并留传下来,无疑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史书。

多种龚自珍年谱记载,“夏,考军机章京,未录,赋《小游仙》十五首,遂破戒作诗。”考军机章京落败,对龚自珍情绪必然也会有挫伤。额头上的“血”让他意识到,如此仕途捷径,也不是凭才学就能走通的。正因为考军机章京,成为绕开科举考场进入升官通途的捷径,无疑会引发无数人不择手段摆平“关键人物”。这里的所谓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

且看《小游仙》其一诗中的描述:“历劫

丹砂道未成,天风鸾鹤怨三生。是谁指与游仙路?抄过蓬莱隔岸行。”首句是说自己,如同道家修炼那样,虽然经过了重重磨难,并未达到骑鸾鹤、翔天风的得道成仙的境界。有人指点道,你可以绕过迷雾漫漫的缥缈的蓬莱仙山,从而抵达向往的成为仙人的境界啊!其含义就是,会试不成功,索性直接去考军机章京,进入核心权力部门,也是一条成功之路啊!

可是当谁都知道这是一条升迁的捷径时,该会有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里钻呢?以和坤巨贪为首形成的贪腐之风,渗透到了乾嘉以来官场的角角落落。定庵先生难道不清楚,他要铺一条通往军机处的路径,该需要多少银子?此种无耻龌龊的勾当,是他这样一身正气的书生愿意做的吗?

《小游仙》其五:“寒喧上界本来希,不怨仙官识面迟。侥幸梁清一私语,回头还恐岁星疑。”在琼楼仙界相互间的问候、关心本来就很少,所以不怨仙官们与自己迟迟不相识。偶然有人与自己悄悄说几句话,还得惊恐地看看,有未引起其他官员的猜疑。“梁清”,古代神话人物;与句句中“岁星”,同指军机处官员。这首诗是形容军机处冷漠、紧张、相互猜疑的人际环境。

《小游仙》其七:“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几辈凡胎无觅处,仙姨初攀可怜虫。”军机处(丹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容纳的,它当然有自己选定的“潜规则”,只有那些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投其所好、没有个性和才学的庸常之辈,才是他们欣赏的。那些无缘进入仙界的凡胎(平庸的人),才会可怜兮兮地求仙姨(喻军机大臣)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得道成仙。在清代,军机章京最初由军机大臣自己选用,如此军机大臣手中的人事权力显得太大,滋生腐败是必然的。后来,清廷制定考选条例,规定在内阁中书和六部部曹中保送,经过军机处考试后录用。但选用的大权仍然在军机大臣手中。如果不把军机大臣喂饱,或你与军机大臣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像龚自珍这样通过正常途径企图进入军机处,几乎连门儿也没有。龚自珍考军机章京不被录用,应该是预料中的事。

剑魂箫韵



龚自珍传
陈歆耕